

戴密微先生 Paul Demiéville (一八九四～一九七九)

法國桀溺 Jean-Pierre Dieny 撰(譯者注)
吳其昱 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法蘭西漢學遭受沉重打擊。在很短時期內，三位主要漢學教授，先後去世。社會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一八八四至一九四〇)「有力之發明者」(一)，戴密微先生承認伊有哲學家及有時又有詩人之氣質，在法國被侵時即憂憤而卒。馬伯樂(Henri Maspéro)(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五)，「中國上古史專家」，「思想中具有閃爍之火花」，「全才」之人物瘐死納粹德國Buchenwald集中營內，數月之後，一九四五年底「文獻學天才」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八至一九四五)又相繼病卒。法國漢學界在如此削弱情形下仍得在戰後困難中繼續工作。世界平衡局勢已有變更與中國時正覺醒，同時歐洲亦開始自我懷疑，失去自信，甚至影響到十九世紀以來之學院傳統，漢學方面亦須放棄以往之歐洲中心成見，必須重行考慮、研究對象，更須自謙與真實同情，不久，美國大學漢學中心即將使古老歐洲研究機關漸漸減色，蘇聯亦不消極。又應注意一顯然事實：不讀日

譯者注：本文法文原題作：Paul Demieville (1894 — 1979)，原文將在法京 Annuair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高級研究學校年報)發表，原文長二十五頁，由作者選出十分之六七，先交敦煌學漢譯發表。譯文承作者審閱一過詳加校正，附此誌謝。作者Jean-Pierre Diény先生為法京高級研究學校(第四組)教授，戴先生高弟，中國古典文學專家。

(一)引號中為戴密微先生語。

文漢學著作，則漢學成果終不免疏漏，際茲舊學催萎，新學分散，法蘭西漢學應取何新姿態？自法王路易十四（一六三八生，一六四三即位，一七一五薨）時代耶穌會士起直至沙畹（Éd. Chavannes）（一八六五至一九一八）教授可說漢學早成為法國特長學問之一。如今各國漢學急起直追，新刊潮湧，常需多種語言知識。新競爭迫使法國漢學家須自尋出路，並須與全世界漢學家合作。

爲了解此種變遷，而且要適應新局勢，爲引導在未知海洋上之航行，應有一不平凡之領導者，此即保爾戴密微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伊正五十歲，面臨新事業之開展，伊亦愉快勝任有所預備（□）。

先生生於瑞士洛桑阿爾卑斯山麓，懷鄉之情根深蒂固。始終喜愛山居，具有山地居民之毅力、堅強與固執，但不厭棄山谷，伊常愛自我浸潤，自知如何走出其故鄉小天地，並向週圍各大文化圈知所汲取。在伯爾尼及慕尼黑通過德文學習，在巴黎用法文學習，至於義大利文學尤有偏嗜，更遠則去倫敦及愛丁堡，先生又學俄語有時甚至欲專修俄文，在英時始注視遠東，並開始學習漢文，一九一八年得東方語言學校漢文文憑。一九一九入法國極東學院，先生是時年二十五，已學會歐洲重要文化語言及應用。

下一階段先生遠赴遠東，先學漢文，次學日語，又學梵文，其後十年餘，先生在東方學家形成上實地邁向完善，即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先生居住河內爲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在中國執教於廈門大學，在日本先作東京日佛會館（Maison Franco-Japonaise）研究員後任該館館長，先生先遊學歐洲，復又遊學東亞。

經過具有模範性之長期準備，返法後先生被任命爲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校漢文教授，任期自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

在此期間先生發現敦煌寫本之重要性。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有名學者王重民被

（□）一九七三年先生論文選集二種出版於荷蘭萊頓：一、*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漢學選集）及二、*Choix d'études bouddhiques*（佛學選集）。每冊前有先生一九二〇至一九七一年間著作目錄，極佳。

派來法在國立巴黎圖書館研究伯希和將來敦煌文獻及其他書籍，返國後不久，曾出長北京圖書館，一九五〇年戴先生在吐蕃之法諱一書中有如下記載：「我追憶戰前數年生活，輒感惘然。王重民每週星期三至我家，帶來一週間之新發現。我與伊共同檢閱」(≡)，敦煌之發現對戴先生之生涯有極重要之影響，敦煌研究決定戴先生後來研究之方向，並直接或間接啟發其後半生所作之豐富而多樣之研究。

在注意力尚未集中於敦煌文獻並決定其新路線之前，戴先生已有大量重要著作發表。就其二次大戰前之著述而論，其重要著作主要為佛教研究，以及在法國極東學院院刊及亞洲學報中發表之大部份書評。此外先生為法寶義琳主編，法寶義琳為「據中日文資料用法文解說之佛教百科辭彙」先由法國梵學教授勒維Sylvain Lévi（一八六三至一九三五）及日本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至一九四五）教授在東京發起創刊，前三分冊已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出版，一九六七年編輯部重新改組繼續編修。戴先生仍擔任指導，逝世前數月伊曾審閱第五分冊原稿。

佛教研究為其早期專門之學問，因追隨其業師梵學家勒維教授及漢學家沙畹教授（後者復受前者之影響，終於離開正統漢學而作佛書翻譯），戴先生起先在漢文文獻中尋找佛學資料來源，在此期間先生獲得巨量漢文佛學文獻，最廣博之知識及最細密之悟解，此門謹嚴之學問使伊以後具有決定性之優越性。一般西方漢學家常未獲得此類知識。而先生能試從印度佛教教義譯文中發現中國文化要義。

戴先生早期學問實已溢出佛教研究，其研究範圍甚至非常廣博，從開始即見伊之好奇心無有限境，自始至終具有最年青及最合用之精神，只為指出伊之主要興趣，如其師沙畹，伊亦研究考古學；又如其友馬伯樂，研究語言學及人類學。伊又有營造法式研究，且已譯為漢文伊亦愛好音樂，又受其友人胡適影響，喜愛俗語文學。

二次大戰後法蘭西漢學前途全寄託在戴密微先生身上。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伊擔任三種新任務，構成將來活動範圍。三者幾乎同時任命，高級研究學校（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四組教授，法蘭西研究院（Collège de

(≡) *Le concile de Lhasa*（吐蕃之法諱），頁陸（P. VI）。

France) 教授，通報二位主編之一。此後其職務對其研究工作之開展與發揚有決定性之作用。

在高級研究學校，先生繼 Jean Przyluski (一八八五至一九四四) 爲佛教文獻學研究導師。伊對此項工作教學實優於任何其他專家，此講座先由 Eugène Burnouf (一八〇一至一八五二) 創始，繼由勒維 Sylvain Lévi 教授加以發展，以比較文獻學方法爲主。作爲比較語文學家，伊自有伊以爲其師特有之品質；直覺批評，廣徵博考之主張，以及執拗之好奇心。

此位研究指導人知道如何組織使聽講者獲益，加上最有益於訓練之集體閱讀，聯合利用原文及譯本。第一人執梵本，第二人執巴利文本，第三人執西藏文本，第四人執漢本，以資比勘。

先生講授此課十年餘。吾人可以想像此期爲一成果期，同時爲一新階段之黎明。

在此期間戴密微先生刊佈其最鉅之著作吐蕃之法諺 (Le Concile de Lhasa, 一九五二年巴黎)。其中最早部分寫於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前數年。但後來有關資料不斷增加，以至注釋極端豐富。此書後半爲「歷史注釋」，關於唐蕃關係徵考資料，博洽異常。此書前半爲八世紀末期入蕃之漢僧與梵僧論爭之漢文文獻尤要者。此文獻爲敦煌寫本記述漢地禪僧與梵僧關於佛教教義及其解釋之異見。

在高級研究學校戴先生亦用敦煌禪宗資料作深入之研究，敦煌禪宗資料之發現或許成爲其學問演變之重要時機。伊講授六祖壇經。六祖慧能 (六八三至七一三) 爲真正禪宗之創始人物，其大衆化及攻擊性引起伊之興趣。伊又講授神會 (七六二卒) 禪學。當時禪宗大師之創造精神，使佛教相當漢化，深得伊之同情及信服，與其漢學趣味革新亦相近，一如其佛學前輩，伊先從漢文文獻中汲取認識較佳之佛教資料，但後來之展望卻與相反，從此佛教被用作中國文化秘密之啟示，且可由此作更深入之探究。

一九五六年底戴先生離開高級研究學校。此次辭職可使伊得專門從事另一研究範圍，以免重覆及過度忙碌，十年前約在任教高級研究學校一年之後，伊被提名爲法蘭西研究院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繼馬伯樂爲中國語言與文學講座教授。直至一九六四年止，幾乎二十年間，伊得展其所長。

初去法蘭西研究院時戴先生即講授莊子，此次課程選授亦極富啟發性。此爲首次

溯源至佛教傳入中國之前，開始從事上古中國之廣泛研究，伊開始即研究中國最深刻之思想家，亦最佳之文學家。對於莊子其人，伊亦以爲與唐代禪師極爲相近，而唐代禪師伊亦已開始相當熟諳。因禪學豈非富於佛學趣味之莊子？又先生沉潛於中國文化之核心，開闢輻射式走廊二道：一爲沸騰之戰國時代。是時出現一天才思想家，酷好自由者，諷刺者及詩人。另一形成於中世中期，正當中國全力消化來勢洶洶之佛教思潮之時，此二事之會合必可有重要成就。

作爲研究之一方面，戴先生講釋莊子三章，一九五一年即擬印佈其翻譯，可惜始終未出，努力莊子研究之繼續，爲先秦哲學多種基本概念之研究，如理所以維持社會秩序，戴先生曾作理之演變分析，不愧大師之作，先生此處研究又跨二層面，一爲先秦傳統，一爲佛教貢獻，此二者爲中國思想二大成份。

在另一方面敦煌文獻仍是中國佛學禪宗研究基礎，尤其是有關頓、漸二派對立產生之背景。關於此種根本之對立，戴先生所舉示之思想各層面無不中肯，而且尋得中國禪宗根源，不在印度，而在傳統中國。此種研究之結果即其所撰光輝耀目之論文，題爲精神鏡，在文中伊接連比較西方神秘與中國哲學，鏡之影象喻爲現象界不真實性及絕對之獲得之雙重性象徵。其解釋至爲清楚。

然而此沉思之片刻僅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化接觸後所起之形態變化問題。戴先生喜歡標示禪僧如何重新發明一種新佛教，剔除印度佛教之內容，庶幾成爲道地之中國宗教，伊曾開數種課程，講述禪宗史，禪宗之來源，禪宗之“先史”時期，充滿傳說之禪宗世系譜，教義之衝突，以及對中國文化及鄰近民族文化之貢獻。可惜未曾寫成付印，但至少我等已有一冊可嘆美之臨濟錄法譯本，臨濟錄富於才情，謎語，笑罵，矛盾，譏刺，隱藏深度思想，如無適當高度智慧，則不能了解。應有與作者同樣之天才，熟練辯證雖作者拒絕任何推論，但仍能捉摸其意向，始能由直覺猜測未說出之信息。

但禪學又爲戴先生留下另一種啟示：中國詩學，禪師如臨濟自己常用詩自述，即屬此種範圍。數年實踐之後，伊方寫出：「哲理與詩學之關係，無疑的，中國文化中，二者密切聯繫無與倫比，在中國，抽象與系統全爲具體之直覺所代替。」下一年在許多唐宋詩學理論家影響下，伊又特別加重指出詩之靈感何等接近禪之悟解。

一九五六年以來，伊最用力研讀之詩人爲王梵志。其法譯作：“Wang le

Z élateur ”王梵志爲一在家佛教詩人，其傳記半爲傳說，宋以後人鮮有提其詩集者，幸敦煌寫本有其詩集可以重行輯錄。先生至逝世前不久，始編定王梵志詩，並譯爲法文。梵志詩多當時俗語，玩世不恭，使人氣惱，先生輯譯之，王梵志詩已付印，惜已不及有見到校樣印出之愉快。

一九六二年聯合國文教處支助中國古代詩選，先生爲全部譯稿潤色。一九五七年所作詩選導言爲法文讀者所能見之最佳綜合介紹，先生用字妥貼，清晰而文雅，亦成爲古典之作，詩選導言中對禪學所標榜者屢有反響，在詩中文人「得享放棄儀式與理智之自由……保持天真。」或者，對導言首段所引道家譬喻之回答，結論中那句「智識，速退！」真像是臨濟（八六七卒）所說。

先生興趣從佛教詩轉到偉大傳統文人詩，在這兩種潮流派會合點聳立有謝靈運（三八五至四三三）偉大形象，先生在研究六朝佛教與詩之關係過程中，遇到此位貴族詩人，後來尙友謝靈運，謝靈運爲一佛教徒，但作者與作品仍有其他吸引之處，即以二者密切關係爲始：「不反應詩人經驗，對一生中榮辱窮通與內心矛盾未能顯示者恐非是詩。如有詩人可應用羅大綱之口號，『第一須是人，其次才是詩人。』來批評，則謝靈運正符此說」。先生眼中，體驗念生活未深者，無文學佳作，評謝曰：「中國給予世人最偉大詩人之一」。在法蘭西研究院，謝靈運爲其最後數年講課之專題（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

先生常喜提謝靈運在廣州行刑前所作臨終詩。也許此詩及其他僧人臨終詩使伊擬哀集一臨終詩集，至伊臨終時猶作此事，伊已搜集數百首遺世詩一禪師辭世作偈相沿成風一希望有一日能根據其舊稿出一遺集，臨終詩集。

先生激賞漢詩相當遲，但成爲終生嗜好，六十年代中一日告我：「如重學漢學，當選漢詩研究……」先生屢在文中非常明白肯定此種偏好，確言「漢詩爲中國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國天才之最高表現」。此傾向使伊與其前輩大家有異，如沙畹「恐怖純文學」，馬伯樂則興趣甚少，先生則擴大漢學研究範圍。退休後不久與饒宗頤氏合作刊佈敦煌曲一巨冊，殊堪嘆美。先生在書中至爲謙遜以饒書改譯者自居。實則譯者不自滿於翻譯專門文字微妙性之難能可貴，常加種種補充並提高其精確性。先生每謂此舉「出於游戲」，從饒書校注詞中，選譯三十餘首，均文學珍品，趣味雋永以前未嘗有

人加以正確品評。

從敦煌寫本至禪宗，由禪宗至佛教詩，然後再進至傳統文人詩，似即大師研究之歷程。現須回溯更早時期：敦煌寫本提供先生另一種新發現之機會，雖不如漢詩對伊之影響，在其一生中如是深刻與持久，但至少有一十二年左右（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三）使伊得以寫成同樣重要著作，此即俗語文學，源自唐代佛教導俗工作。先生從禪宗粗俗詩到謝靈運之古典詩，此過程頗不平常（正如從吸收融化佛教方式上重新發現中國一樣）。但吾人不應忘記先生早對半詩半文之文體發生興趣，此種文體與古典傳統有若胡越。此十數年間在法蘭西研究院先生講授多篇變文，將歷史及傳說之插曲或故事，作小說化之鋪張，相當於法國文學中之「*chanteables*」，此種工作甚不易做，寫本之解讀，文字之訂正，俗語之解釋。實際是創始一門新科學，跨越數種專門學科，即所謂敦煌學「*touenhouangologie*」。在西方先生是倡導者，先生曾譯變文數種分別發表，可惜未輯成變文選集，雖伊一九五三年起即作此想。

如此自青年時起即學得漢學研究一切研究工具知識，先生在趨近中國文明時，獲得不少益處，如中國面臨佛教傳入及吸收時之特殊問題及敦煌寫本中許多未曾刊佈之資料，在此類基礎上其著作自然會特別繁多。其成就豐富而多樣，此處不能盡述，如略提伊所達成有關中國文化要義之見解，或許有用，請試讀數則伊所提議之定義：

一九五七年：「一個偉大民族，既切實又玄虛……」（中國詩選，導論，頁二七；漢學選集，頁三〇六）。

一九五九年：「真正奇跡，非在空中飛翔，非在水面步行，而是在地上行走，與他人無異。自由放縱，無拘無束，少生麻煩，無所事事（無事）！此即理性所勸告，因臨濟常教其徒保持正見，勿任外界迷失其心中正理，堅持以內在絕對信心，真人信心為信心……如不考慮歷史問題，此僧否認整個哲學，甚似極值注意之中國哲學家」（法蘭西研究院年刊，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頁四三六至四三七；漢學選集，頁二四七至二四八）。

一九六一年：「中國思想基本特點為對抽象化與『空言』之先天性厭惡」（*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 [章學誠（一七三八至一八〇一）及其史學]，*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中日史家），W. Beasley

及 E.G.Pulleyblank 編，一九六一年倫敦，頁一八一；漢學選集，頁二六九）^(四)

一九七〇年：「返回簡樸，返回即時直覺，返回自然堅持實踐，排斥抽象化及系統精神，如許傑出之中國精神尤其道家精神之特點」〔*Le bouddhisme chinois*（中國佛教），見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Histoire des religions*（宗教史），第一冊，一九七〇年巴黎，頁一二九四及佛學選集頁四一〇〕。

一九七〇年：「具體，即時，生動實踐之奇妙意識，再加對無根理論之種種極力拒斥，無有較此類更中國式，與印度相反，中國緊握現實，無有較此更現實之思想。此即為何此種簡朴思想，使吾人（歐洲）感覺困惑，余謂，但如有人一加品嘗，便覺抽象理論之無味。馬克斯教條須在彼處當心掙扎，否則便不免遭受如佛教教條為臨濟呵斥之下場」（*Les Entretiens de Lin-tsi*（臨濟錄），*Hermès*，第七冊，一九七〇，頁八十及佛學選集，頁四五五）。

戴密微先生常擬描述如此中國深刻而真實之輪廓終於繪出其本來面目，通過漢學研究，伊亦顯露自己，簡朴堅確之見識，與其傑出之才智相結合，伊對生活與現實世界有無法鑿足之愛好，其精神安祥遨遊於純粹理想之世界，一如最佳之中國，伊「解除」約束，不惜放棄相對之錯綜，而偏嗜絕對之沉思。先生為人，工作勤奮，要求嚴格，其嚴竣與充滿嫵媚之想像相配合。伊痛惡自負與做作，但只求自然，不免為新奇甚至古怪所吸引，先生尤其富於人情味，至深且切，對真率之人，永遠開誠相待。

沉潛漢學得識其中國面目—此種文化因緣固無礙其判斷，伊仍保持清醒，時加諷喻，先生之生活與著作互相諧和。吾人可以斷言，伊曾體驗中國，但未否認自己，伊愛好精美烹調、花卉、山水及其故鄉，伊雖最合群，亦常常返回其高山牧場，其村中農夫默默送伊至墓地，其墓位於一丘陵之上，從該處可望見阿爾卑斯山山脈，當伊述及「中國文學中之山」時，其語氣精確，熱情洋溢。伊深入大家作品時，即尚友古人^(五)

(四) *Annuair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高級研究學校年報）一九五〇／一九五一，頁六二。

(五) 關於章學誠，戴先生謂「我與伊相往來，在不和與失歡之後，常重歸於好」，*JAOS*（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一九七六年，頁五九五；漢學選集，頁六二八。

，伊與其經常研究之作者相處。蓋伊等不僅有同一天才力量，而且同樣高貴莊嚴，並有同等不輕信之獨立性。伊等均為多少具有堅強信念之人，不屑與時俯仰，珍視自己自由，甚至不顧貧窮與死亡。謝靈運、臨濟禪師、史學家章學誠、其高尚友朋莫不皆然。至於王梵志，身世晦暗，但吾人可以確信，如實有其人，必屬同一氣質之反抗者，在此類「強項」者（伊用以稱臨濟之語）或許仍須加入一婦人，毫不減色之歷史人物：武則天（六二四至七〇五）（中國史上）唯一之婦女，統治帝國，建立自己皇朝，為保持權力，不惜犯罪作惡。但與眾不同，常為文人所羞辱，為滿足其強烈慾望，武氏亦有堅決不回之毅力。此怪人吸引先生注意，並使之迷惑，提及武氏戲劇式之生平，常不能自己。一九七六年先生又舊事重提，在為 A. Forte 君論文所作之長篇書評中⁽⁶⁾，先生評語固友好褒譽，但篇幅不多，文中較多部分，均涉及武后其人，「如火」之人物，同年重述此意「誠然，武后仍是富於吸引力之人物，雖然兇暴、荒謬、罪大惡極」。⁽⁷⁾

我等西方之漢學家，與其研究對象能取有機聯繫，便不平常，學者與所學實際相依為命（可以避開兩種決定命運之礁石：失去真正中國或失去自己特性），如果戴密微先生能實現此種諸和之平衡，則部份應該歸功於其中國好友之助力，此等在伊周圍之友人代表中國（文化）。計有王重民、林藜光以及較近「現在生存最大漢學家之一」⁽⁸⁾。在伊逝世之前數日，以其為最佳之友人。合作，無寧說是二學者間親近關係彼此均有長期切磋之益，一九六六年先生邀此友去瑞士，訪問之後，伊等共同刊佈黑湖集，以誌同遊，先生將其友逐日所作詩，譯為法文。兩種文化歷史性之紀念及文學性之回憶，充滿詩及附注中，瑞士與中國之山同聲相應。兩種世界在模範友誼支持下，互相交接。此詩集亦可象徵學者如先生者之貢獻：先生之漢學以科學為基礎，藉理智與感

(6) *T'oung Pao*（通報），LXIV 1-3 一九七八年，頁一四四至一五八。

(7) BEFEO（法國極東學院院刊），LXIII，一九七六年，頁四五一。

(8) *Le recueil du Lac noir* 黑湖集，EA（Etudes Asiatiques 亞洲研究），XXII，一九六八，頁一，（瑞士伯爾尼），漢學選集，頁五三三。

情之光輝滲入生活平衡而適中。所有此疆彼界均已消失，所有一偏之見，均已推翻，此種漢學成爲普遍之調停者。

先生雖未如葛蘭言與馬伯樂留下大量著作或系統論述，但伊在七星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中的中國佛教史概述，非常精彩，亦只長七十頁。至其專書主要仍是翻譯，伴有不可忽視之注釋。其著作外觀似頗分散，儘管上面特別指出其書之深刻連貫性與統一性，仍可用下述理由解釋：即生命之沖動優先於純智識之顧慮是也^(九)。先生對系統化與新創理論不甚輕信。其著作並非刻意造作，而是人格開展之自然結果，再加機遇與好奇心。大概由於同樣理由，伊雖然對文學研究興趣愈來愈高，但並未重視新評論（*Nonvelle critique*）之喧鬧，以爲後來文學理論之繁興。伊從事文學作品評論與翻譯，由於本能，並未細問此等工作是否應該與可能。伊從事此類工作，在其判斷與趣味穩妥上，得到充分保證。

先生之活動不限於教學與研究，伊對漢學研究之發展貢獻全部精力。由於竭盡心力，再加其個人物望，數十年來伊成爲年輕一代漢學家之導師與愛護者。多少手稿無其啟發，勘正與序引？多少職位無其支持？先生之領導絕不專擅。但謹慎執行，且有信賴別人之自然傾向。學術機關與教研人員均獲其支持。一九五一年先生獲選爲法國學士院院士。同年法國極東學院（*E. F. E. O.*）慶祝五十週年紀念，先生任爲該校管理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四年爲該校董事會董事。吾人可以見到先生每年向法國學士院所作該校詳細工作報告。先生於其中列舉該校研究員之專著，該院工作之成就及需要。先生亦在該校開始其研究員生涯。

先生以博學擔任通報（*T'oung Pao*）編輯，其工作之榮譽與爲時之長久無逾於此者。三十年間伊先後與J. J. L. Duyvendak及A. F. P. Hulsewé二教授合作。不以保持通報學術水準及名譽爲滿足，伊繼續不懈用筆寫作使通報成爲消息與聯絡之工具，增加匯報與書評。伊以爲必須宣揚一般不易爲人所知之日本及俄羅斯學者之

(九)一九四八年戴先生寫：「中國人生活第一」（*T'oung Pao*, XXXV III 頁三六），

其想法亦與之同否？

重要著作。伊經常刊佈較長提要，均是細心閱讀與領會之成果。

通報之編輯及其個人著作之聲譽，使先生得與全球最佳漢學家互通聲氣。亞洲一如歐洲幾乎處處歡迎其訪問，傳佈其精彩講辭。巴黎因先生得繼續為具有吸引力漢學中心之一。最近不久前，其訪謁者驚奇其漢學消息之靈通，而從先生處獲得如許消息。此無他，先生待人友好，無人能及故也，自始至終先生深知如何保持接觸與交談。至其對人關係，禮貌和藹，甚至謹慎均具此同樣特色。在差異甚大之老少兩代間，在無所適從之學科間，以及在東方與西方間，先生為一聯繫者，絕妙之調和者。君子，十全之君子，曾與吾人此一教訓：法蘭西人、歐羅巴人、應保持本色；如果中國人保持其本色，實我輩最佳之友人也。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先生在法蘭西學院開講式致詞之未提及其前任及「承接此漢學講座之艱難責任」。又謂「此種繼承實一重負。我希望不致失敗，並對保持漢學水準方面，儘我力量，能夠有所貢獻，以傳遞高舉之火炬」(+)。今日，先生之弟子及所有敬愛先生者之哀思，及其繼續敬仰亦足證明先生之使命確已完成而且遺產大增。

(+) T'oung Pao, XXXV III, 一九四八, 頁四二。